

中共中央研究院: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的重要尝试

张忠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西城 100009)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 中共设立马列学院负责系统引介马列主义理论, 继而将其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尝试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实际, 随后成立中央研究院推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作出重要贡献。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共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开创中共设置专职机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致力于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形成了重视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优良传统。

【关键词】中央研究院; 毛泽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图分类号】 D231; 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0351(2023)02-0082-12

DOI:10.16223/j.cnki.cn61-1456/c.2023.02.008

中共中央研究院是中共民主革命时期第一个专职研究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机构, 是中共中央寄予厚望的全党最高理论学府。目前, 关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单个研究室, 注重探讨该研究室在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变迁中的影响, 对于从整体上探讨其研究工作实践的成果较少, 已有研究偏于宏大叙事, 注重罗列研究计划, 而对于研究工作的实态缺乏细致分析。《论延安中央研究院》是从整体上探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成果, 该文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角度指出其“代表着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正确方向”, 从学术文化顺利发展的层面论析学术与政治的相互关系^[1]。学界关注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的研究, 注重考察中国教育研究室发展演变的

历史脉络^[2], 探讨其研究工作的实践展开、研究成果和基本经验^[3]; 简要介绍新闻研究室的历史^[4], 指出其草拟的研究计划, 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办新闻学教学研究机构并进而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设想密切相关^[5]。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角度探究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是从整体上对其进行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 有助于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沿革的角度梳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一、中央研究院肩负构建马克思主义 理论体系的重大使命

在阐述中央研究院担负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理

【收稿日期】 2023-01-07

【作者简介】 张忠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暨政治与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与实践研究”(18CDJ008)。

论体系的重大使命问题时，有必要梳理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历程，从中理解中共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知态度的发展演变。

（一）马列学院负责系统引介马列主义理论

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38年5月的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抵达延安后，处于从国内阶级斗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纷纭复杂的局势迫切需要马列主义理论指导。当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缺乏，成为党内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附设张闻天兼任主任的经典著作编译部，是中共历史上设置专职机构从事编译事业的开始。这是中共“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6] 1}，中央将其定位为“最高学府”^{[7] 40}，担负起培养理论人才与提高老干部的理论水平的职责。马列学院在教学中“存在着某些教条主义色彩”^{[8] 176}，部分学员“认为理论工作者可以不研究实际问题”^[9]。

编译部成立之初，张闻天即着手制定编译计划，为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理论，决定编译出版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起全党范围的理论学习背景下，马列著作编译工作受到党的高度重视，先后抽调精通外语的干部着手编译。为保证编译人员全身心投入工作，马列学院为编译人员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在中央支持和编译人员的努力下，编译部先后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十种、《列宁选集》十六卷，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先后在根据地 and 国统区出版发行。这一阶段的编译工作服务于抗日战争大局，与中国社会变革实践发展方向一致，注重“发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社会变革的功能，为中共制定革命战略与策略提供理论支持，是这一时期编译工作的根本宗旨。在这一宗旨指导下，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战略策略理论、国家政权理论，成为马列学院编译工作的主要译介内容”。概言之，“中共编译工作的目的，在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提供理论

支持”^[10]。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指出党员干部中很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人们务必遵守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基本原则，在革命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理论研究“应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由此出发去研究马列主义，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他主张“依据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与必要的结论”。强调“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消除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11]。

根据报告的指示精神，干部教育领域开始进行组织机构的改组，理论重心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阐发中国革命实际。

（二）马列研究院尝试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实际

1941年7月17日，马列学院正式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在成立大会发表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阐明中央改组成立马列研究院的原因和目的。首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是由于“现在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大正的地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你们研究院，一定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方针，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研究作风，这样你们的研究工作才会取得成功”。其次，着重阐述实事求是问题，要求深入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为此，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要改变从书本到书本的方式，要求走出机关、教室、书斋，到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去。最后，阐明中央成立研究院的目的，意在推动全党树立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讲话申明：“中央要求新成立的研究院，一定要养成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作风。”^[12]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

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且将其上升到马列研究院的工作作风的高度,指明研究院此后的工作方向。由于包括马列研究院领导人在内的多数同志,未能深刻理解毛泽东上述指示精神,因此在工作实践中变化不大^[13],改组未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此次改组表明,中共对马列主义的重心,由译介引进马列主义转向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与这一转变相适应,这次改组成为中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分水岭,编译部无形取消,致使《列宁选集》编译工作一时中断,编译工作蓬勃发展的局面停滞下来^[10]。

鉴于全党“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14] 324。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加强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15] 530-533。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延安干部学校的教育工作再次提出批评,要求对干部教育进行重大改造,彻底纠正教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会议决定由张闻天领衔组建专门机构,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相应的文件^[14] 324-325。马列研究院改组后的实际表现未尽如人意,促使中央采取措施继续推动其改革,以更加鲜明地突出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主旨。

(三) 中央研究院肩负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任

1941年9月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14] 326。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宣部,“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15] 762。为避免教条主义倾向在干部教育中再次滋生,毛泽东在修改该《决定》时重申,关于理论的教学必须纠正不注重领会其实质和应用,而注重了解形式和死读的错

误方向,务必使学者在领会马列主义实质的基础上将其具体运用于中国实际^[14] 346。

为顺应中央改造党内思想路线的形势,中央研究院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和方法,基本遵循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实事求是》讲话的指示精神^[16] 11。中央研究院成立伊始,依据上述指示精神制定概括为“大、变、化”三个字的治学方针,其含义如下:“大,志向要大,决心要大;变,是指学习方法要变;化,是联系实际,具体应用,也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16] 129。依据上述方针,中央授权由张闻天对研究机构进行规划。在具体的规划中,努力贯彻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取消了马列学院下设的联共党史研究室、中国问题研究室,将哲学研究室改组为思想文化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细化为政治研究室和经济研究室^[6] 247。据此,中央研究院设立政治、经济、文艺、文化思想、历史、教育、新闻、俄语、国际问题等九个研究室,前七个研究室名称前分别冠以“中国”二字,以突出运用理论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办院宗旨。各研究室分别制定半年至三年的研究计划,确定研究任务与内容,研究人员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开展集体研究。各“研究室”的研究内容,都分为现状、历史和理论三个方面。要求通过对当前实际和历史实际的调查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理论上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17]。中央研究院此次改组,不仅表现在机构名称的形式变化,而且“对各研究室的业务规划都以研究中国实际为主,这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改进”^[16] 72-73。因而,实现了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主的转变,而且业务规划适时转变治学方针,从重视读“本本”到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突出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以反对主观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8] 373, 374,推动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初创的中央研究院,具有“推进学术文化全面转型”高度自觉性^[1],致

力于“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新的意识形态”^{[19] 540}，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自觉性鲜明体现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变化，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到注重运用其对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研究，已经在凸显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意图。毛泽东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战略构想一以贯之，这一认识在革命实践中日益深化，并由中央研究院在研究工作中付诸实施。

二、中央研究院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展开

中央研究院开展工作半年左右即投入整风运动，多数研究室取得的科研成果有限，但其基本方向和研究方法是遵循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讲话中提出的基本要求的^{[16] 11}。鉴于此，本文拟针对成果相对较多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的科研计划 and 实践，对其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历程展开探讨。

（一）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以研究哲学为主，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革命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为目的，从本室研究人员理论水平普遍较低的实际出发，坚持学以致用、学习研究同步、循序渐进的原则。该室制定的三年研究计划表明：在研究工作方面，要求在三年内完成古代至今的中国文化思想史料的搜集与编辑，写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编写中国哲学思想史，并“依据中国革命经验写成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研究中国民间的思想状况。在学习方面，要求学习以近代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为主的中国历史，涉猎西洋史、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文艺作品、自然科学知识、中国思想文化古典书籍。该室同时制定了第一年工作计

划，在研究工作方面，要求“编辑近代思想史料（中国近百年学案，本室只担任搜集五四以来的资料）及国民党过去与现在的资料”，搜集完成抗战以来的文化思想材料，编写抗战前各派思想的批判研究，“初步调查边区民众的文化思想生活”，“编辩证法唯物论的初步提纲”。上述研究工作指定了任务分工^{[16] 268-270}。

制定上述计划后，文化思想研究室将其作为开展研究的指导纲领而付诸实施，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三方面：

在资料收集方面，“全室完成了抗战以来各派哲学思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这里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有蒋介石、陈立夫、阎锡山等人以及日本法西斯的反动哲学思想。我们还搜集了五四以来各派哲学思想资料。这两部经过初步分析研究和整理出来的资料，各有几十万字。可惜后来都散失了。”^{[16] 44}

在研究工作方面，为配合中央发起的改造思想路线的整风运动，研究室同仁以敏锐的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撰写大量文章批驳主观主义、倡导全党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帮助全党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艾思奇先后发表《反对主观主义》《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学习观念的革新》《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陈茂仪发表《新哲学的实际应用问题》《从〈论持久战〉学习怎样反对主观主义》。李又常译《德波林的自我批评》等。上述部分文章发表于整风运动酝酿阶段的1941年。艾思奇在理论战线上先声夺人，集中精力展开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系统批判，而批判的思想武器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他指出：我们以前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片面的、肤浅的，“事实上是把外国的名著里所抽出来的原则公式看做唯一的理论，而把其他只看做应用。因此，对于中国的理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报告，对于党的文件，就不当做理论而加以重视”。现在真正懂得“我们的理论必须是‘与实际密切联系着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学习理论的

重心不是背诵原则公式,“而是要能把理论的精神与实质,应用于实际。实践是真理的检证,只有在应用当中,才能证明我们是否掌握了真理。……理论既然要加以应用,就必须按照实际的具体情形,把理论具体化,不硬搬公式,乱戴帽子,而要按客观情形灵活应用”。这种做法,才是真正掌握了理论,才是实事求是^{[20] 670-672}。上述文章总结学习体会,介绍学习方法,批驳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推动整顿学风的开展。

在编撰思想方法论著作方面,编辑推动改造学风的《思想方法论》一书,在党史上产生重要影响。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央研究院全体同志旁听。几天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集理论工作者开会,要求系统地摘录马恩列斯著作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编一本《思想方法论》。编辑这本书旨在“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们的思想作风。毛泽东同志批评了主观主义,特别是在当时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在另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的经验主义;还指出有些同志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这里有思想意识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帮助大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他要求把这本书编好”。会上决定把编书任务交给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而以前者为主。会后,艾思奇主持全书的编辑工作,“立即对搜集、摘录和编纂这本书的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思想文化研究室全体成员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张仲实、曾彦修、陈伯达参加编辑。大家广泛搜集当时所能找到的马恩列斯的著作,摘录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历时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编出了这本书^{[16] 44-45, 206}。毛泽东细致通读书稿,对部分摘录予以核对和增删,调整编排次序,修改标题,并拟定书名,实际发挥了主编的职责。该书初由解放社出版,在各根据地多次翻印再版,在整风运动中被指定为党员干部的必读书目,为全党的普遍整风和理论学习,进而改造思想意识、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习仲勋

回忆,当年毛泽东送过他一本,认为这是整风学习的指定书目中“一本最好的哲学书”^{[21] 132-134}。解放战争时期,该书被中央列为十二本“干部必读”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依然是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参考书目,在党员干部学习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方面持续发挥作用。

(二) 建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

1941年9月初,中国教育研究室成立,承担中宣部国民教育研究的任务,旨在“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际”^{[16] 57, 8}。李维汉兼任主任,有研究室兼职秘书华子扬、董纯才、张健、陈元晖(薛尔)、李冰洁、席道崇、翟定一、王志匀、陈璧如、封梧、石澜、黄滨等12人。研究室成立伊始,李维汉即组织全室反复学习和认真讨论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并根据报告的指导思想,结合实际拟定研究室的半年计划和三年研究计划^①。

半年工作计划以在理论和实际上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提高研究室研究和掌握新教育的能力为目的,当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根据地、国统区、敌占区自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注重教育思潮、政策、制度、方法、实行等问题,“特别以学校教育为研究中心。以期于半年内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学及小学教育建设能够得出初步的具体的建议”。根据这一任务,分别组建根据地教育研究小组、国统区教育研究小组、敌伪教育研究小组,规定研究内容、分工、进度等^{[16] 275-277}。依照研究室制定的三年工作计划,在研究内容上突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补习中国的历史社会知识、生物学与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批判性研究各种教育理论的历史与现况为重点,主要关注我、友、敌伪教育现状、中国教育史和西洋近代教育史、现代教育思潮。为贯彻上述研究计划,研究室制定明确的任务分工,指定专人负责。要求每人根据分工开展调查研究,搜集延安已有的书籍报刊,初步整理资料,写成书面材料提交研究室讨论^{[16] 270-275}。

按照上述分工,从1941年9月到1942年3月开始整风前约半年时间,较好地执行了研究计划,

取得一批研究成果。

一是收集整理教育资料，为着手研究作准备。在收集整理资料方面，张健整理了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约五万字的材料；华子扬整理研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陈元晖研究整理了杜威教育思想批判材料约四五万字；陈璧如整理了陈立夫教育思想批判的材料；董纯才整理了边区师范教育的材料^{[16] 59}。研究室的研究资料还有李维汉与李心清此前合编的三本关于敌、友、我宣传教育方面的资料，供给各级宣传教育工作者参考，这套书曾受到毛泽东称赞^{[16] 9}。调查计划主要由王志匀、李冰洁、翟定一实施^{[16] 59}，以调查学校为中心，以期在半年内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小学教育建设提出初步的具体建议，到整风前夕取得了初步成绩^{[16] 9}。1942年3月，中央研究院开展整风运动后，研究工作无法按计划进行，研究室收集的材料来不及讨论。在这期间，除董纯才发表《论国民教育的改造》（《解放日报》1942年9月4日）、《怎样以反党八股的精神编教材》（《解放日报》1942年12月5日）外，其他人都未及将收集的材料写成著作^{[16] 61}。

二是针对当时的教育流派进行研究，分析评判其价值。一方面，教育研究室联合边区教育界成立新教育学会，旨在“提倡教育理论及实际问题研究”。1941年11月，新教育学会成立，决定邀请在延各教育专家“每月举行教育学术讲演一次，邀请在延各教育专家主讲”，首次报告由张闻天在杨家岭大礼堂主讲^[22]。在中国各教育流派中，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具有代表性。他反对仿效外国的“洋八股”，也反对因袭传统的“老八股”，“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探索创立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其教育学说含有若干唯物主义因素，“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因此，1942年3月，新教育学会编辑出版《行知教育论文选集》，以供教育界研究教育之参考^[23]。另一方面，李维汉阅读关于各教育流派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政治的辩证观点予以剖析评判，作了笔记，主要研究陶行知的

教育思想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经集体讨论，研究室肯定前者的进步性，而否定后者。1942年2月，李维汉在研究室召开的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作总结发言：首先，从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角度分析陶行知在政治上的经历，梳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其次，指出生活教育理论和方法中若干问题值得商榷；最后，阐明怎样研究和学习陶行知。陶行知在政治上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教育家，“五四”以后逐渐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大体上是沿着杜威主义——生活教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道路前进的。他关于生活教育的思想是进步的，基本理念为“一是主张生活教育，反对与生活脱离的洋化教育和封建传统教育；二是主张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反对教育和文化为少数人独占；三是主张教、学、做合一，反对为读书而读书”。3月5日，新教育学会召开纪念生活教育十五周年大会，李维汉在会上再次阐述以上观点^{[16] 9-10}。3月19日，研究室召开乡村建设派问题讨论会，李维汉指出：梁漱溟的著述和乡村建设实践表明他是半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所谓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对立而只有职业分工，中国社会关系是伦理关系而不是阶级关系，主张“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思想，同蒋介石、陈立夫有共同点。梁漱溟企图通过开办乡村学校的教育方法来维护濒临崩溃的半封建制度，主张驯服农民，因此又同蒋、陈有区别。乡村建设运动实际已经破产，并未得到农民的拥护，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表示不满。乡村建设派在教育上的某些做法，还应参考与研究。我们要把乡村建设派中的青年和梁漱溟区别开来。许多青年已经从梁漱溟思想中解放出来，有的已加入中国共产党^{[24] 366}。

教育研究室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为目的，这是其区别于当时其他教育研究机构的特点。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室的资料收集和初步整理研究，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为新民

主义教育理论的创立，为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3]。

（三）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中国历史研究室由原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改组成立后，研究任务未变，人员流动却很大，原研究室成员谢华（整风开始后调回研究室）、尹达和唐国庆调到其他部门，只有范文澜、杨绍萱、佟冬、金灿然和叶蠼生留下。新来的同志很多，有两位特别研究员齐燕铭和吕振羽，研究员刘亚生，还有研究生陈道、宗箴、李徽、孙孝实、夏奇峰、胡朝芝和湛湘汉，以及吕振羽夫人兼助手江明^{[16] 73-74}。

依据张闻天指示，研究室从事日常工作和加深理论修养的时间各半。在研究方式上，注重“个人独立研究与集体商讨相辅进行，以期逐渐养成独立研究之能力”。理论学习和研究按期进行，暂定一年为一期，每期分别确定中心方向，“第一年为科学方法之修养；第二年为各种非科学的历史方法论之研究与批判；第三年则从事中国历史轮廓之研究，从实际运用中锻炼已学习之方法”。为切实开展理论学习，组织各种读书小组，指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的相关著作作为参考书目，开展集体学习。根据现有人力，将全室研究人员分为近代史组、农民土地组、民族组。关于三年工作计划，近代史组要完成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下册（近代史之部）》（以下简称《简编》）、《苏维埃运动史》《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抗战史》《中国经济制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文学史》，收集《东洋史运动》材料的任务；农民土地组要编写《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法制史》《中国农民战争史》；民族组要编写《民族史》《西南少数民族史》。半年计划拟完成的工作大多由中央指定。上述两个计划均指定任务分工^{[16] 280-283}。

这一研究计划，涉及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及其专门史）和中共党史的各个领域，可谓包罗万象、涉猎庞杂，历史研究室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意图显而易见。同当时研究室的科研力量相比，确实难以完成，研究工作开展半年后，即投身于整风运动，大部分研究计划无从

着手。当时开始编撰的书稿有《简编》《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中级中国史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国文选》。鉴于《简编》出版后产生的重大影响，拟对其写作过程、内容简介和社会影响予以介绍。

《简编》是范文澜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编写的一部新型中国古代通史。因缺乏组织集体编写的经验，研究室同仁对如何编写未能达成一致。初稿完成后，由于详略失当，最后由范文澜独力重新编写^[25]。1941年5月完成上册（上古至唐五代部分），年底完成中册（北宋至鸦片战争前部分），先后于1941年9月、1942年12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本书出版时虽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序言按原来的分工将参加者列名，但学术界公认是范文澜的代表作。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并入中央党校第三部，范文澜调入中宣部工作，继续撰写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计划作为《简编》下册。1945年底，范文澜编撰的近代史部分已完成“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手稿由叶蠼生整理，次年在延安出版，书名改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后更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1947年初开始进行《简编》的修订工作，《中国近代史》的修订也于夏天开始^{[26] 845-847}。

作者从“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等纷乱杂芜的浩瀚典籍中寻找资料，编写成书。序言自陈：“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27] 3}即是说要把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性与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书中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否定了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人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具体运用的体现，也是科学性远远高于为统治阶级张目的旧型史书的根本特征。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划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

试用一般的社会发展原则分析具体的中国历史。中国是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的兴衰历程分成三个时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遵循《共产党宣言》关于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书中对于阶级斗争着重叙述腐化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肯定农民如何被迫起义和反抗异族入侵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意在说明中国人民确有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伟大传统。书中注意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重视记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工农业生产知识^[25]。

《简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进程，从而形成以社会形态模式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通史体系。书中按照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状况，赋予每个朝代一个显著的特点；将每个朝代分属于各个社会历史阶段，并说明朝代之间的发展联系和嬗递因革的形迹；既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一般性，又体现了具体的历史时代^[28]。研究历史，主要目的是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运用马列主义史学理论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了解中国的具体史实，并以中国的具体史实印证一般规律^[29]。《简编》“通过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各个社会阶段的真实状况，而不抽象的拿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硬套在中国历史上”^[28]。该书在体例构建与通俗化方面还存在不少缺点，议论评价存在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对于杰出的封建统治者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作用缺乏应有的肯定与认可，并且“借古说今”的写作手法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如借吴蜀联合拒魏来比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叙述方法上，“把互相有机联系着的统一的整体，排列成许多各个孤立的现象”，对于事物的内部联系缺少具体分析，导致头绪紊乱，不相贯通^[25]。尽管如此，“用新史观来编写整个中国的通史，还是仅此一部”^[29]。范文澜主持编写的《简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科学体系”^{[19] 540}，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中国通史编写。

《简编》出版后，毛泽东对该书“编写工作给

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30] 84}。范文澜主持编撰《简编》，“完全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接受党分配的工作，而不是以专家身份搞什么‘名山事业’”^{[16] 143}。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一个表现即是，从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到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存在期间，历史研究工作偏重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化的宣传，从而使专门的学术研究受到限制。《简编》的编写，本意即是为干部教育提供教材，这部文字浅近的著作有违纯学术作品重视专业性的风格。中共强调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实践，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历史研究室在延安整风前夕成立，即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一部分”^[31]。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高度契合，彰显出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的时代特点，由此滋生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弊端。

除上述三个研究室，其他研究室也进行了一定的资料收集和社会调查工作。政治研究室将主要精力用于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边区社会各方面的生动具体实际，注重将理论运用于实际^{[16] 39}。经济研究室侧重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观点、方法，用以分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积极参加“有关中国经济、边区经济问题的讨论会和调查会，先后写出过《关于法币问题》《研究中国战时经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等探讨现实问题的文章”^{[16] 198-199}。文艺研究室的研究范围涵盖作家、作品和文艺理论，而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为研究重点，并涉及其他文艺流派^{[16] 63}。新闻研究室主要“从中国新闻事业之现状、历史及理论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而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现状应是经常工作^{[16] 277}。国际问题研究室的研究限于依据《帝国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的理论框架，

围绕苏德战争形势和国际动态开展研究，树立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16] 77-78}。俄语研究室成立后，仅继续马列学院时期的俄语教学，整风运动开始后即停止工作^{[16] 86}。上述六个研究室的实践表明，均未取得任何系统化的研究著作，庞大系统的研究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中共一向注重通过开展学术研究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教育。抗战救国的时代洪流，推动一切学术研究“更走向实践之途”，理论斗争与革命实践的联系更加紧密^[32]。随着整风运动的展开，意识形态领域更加注重发挥文化艺术的现实政治功能。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立为中共长期的文化政策予以制度化。他指出，文学艺术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色彩，超阶级的文化艺术是不存在的^{[33] 865}。中宣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泽东关于文艺政策的讲话精神，成为中共“一切文化部门”的指导方针^[34]。中央研究院的理论建设被纳入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轨道。

三、中央研究院研究工作的历史影响

中央研究院研究工作的开展，对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开创中共设置专职机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室设置表明，早在1941年，中共设立的高级研究机构已开始将人文社会科学分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教育学、新闻学、文艺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开展研究，建立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涉猎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领域。如新闻研究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唯一的新闻研究机构”^{[35] 223}，中国教育研究室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教育科学研究机构”^[3]，中国历史研究室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之一。其他研究室的设置，成为该学科在新中国成

立后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雏形。从研究机构组织沿革的角度而言，中央研究院开创中共设置专职机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河。就中央对中央研究院的办学定位和机构沿革而言，中央研究院是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正规化的开端，是中共成建制的研究社会科学的开端，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研究生院的前身”^[17]。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中央研究院开创的研究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后方兴未艾。1949年11月，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于一身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开始办公，半年内先后建立的考古所、语言所、社会所、近代史所成为最早设立的一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体制，哲学社会科学部为四个学部之一，下设七个研究所。到“文革”之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有14个研究机构，建立起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较为完整的研究机构，为社会主义时期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组织依托。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与中国科学院等同，学部时期的14个研究所全部划归过去，成为直属国务院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初创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继承了理论研究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传统，在学科建设和研究机构设置方面强调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繁荣发展社会科学^[36]。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研究院组织沿革的历史表明，其开创的设置专职机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创设，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绵延不绝。

（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

中央研究院重视培养理论人才，在各研究室制定的工作计划中多有体现。除了目前关于文艺研究室和俄文研究室的研究计划散佚之外，其他七个研究室中有四个均明文规定以培养干部为研究目的之一。政治研究室以“培养能掌握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论干部为目的”，教育研究室以“从研究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的干部”为主旨，新

闻研究室旨在培养“有写作能力的新闻工作干部”，历史研究室“目的在培养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历史学者”^{[16] 265, 270, 277, 280}。

为培养一批理论人才，中央规定各研究室在延安范围内分别招考一批研究生，由研究员指导从事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研究室由特别研究员、研究员和研究生三类人组成，分别是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学者、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学者、尚不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青年知识分子^{[21] 124}。特别研究员的“工作职责和研究员相同，只是在生活待遇上得到一些优待”^{[16] 73}。后二者“实际上不易区分，后来并没有形成制度”^{[21] 124}。研究生的学习与工作同时进行，“开始以学习为主，逐步走向独立工作。”^{[16] 73}他们共同参与各项研究工作。

历史研究室注重培养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计划（三年计划）》规定，为逐渐养成研究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提倡个人研究与集体探讨并行的研究方法，理论学习分期进行。每期暂定为一年，分别确立中心研究方向^{[16] 280, 281}。范文澜“关心史学队伍的成长，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的期待，希望后一辈超过前一辈。年轻同志文章写成后，只要提出请求，范文澜同志虽忙，总是不厌烦地看他们的稿子，耐心进行帮助，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37] 32}在此期间，经过各方面努力，到1943年初，历史室成员发展到20余人。在这一过程中，依托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及其改组后的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等史学机构，培养出一批经过长期史学理论和研究实践训练的史学工作者，成为新中国史学界的骨干队伍，深刻影响着延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研究事业。

中国教育研究室培养了一批掌握教育理论和了解教育实践情况的干部，为1957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董纯才、陈元晖、李冰洁、张健、华子扬等成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时的重要骨干^[3]。其他研究室也培养了一批理论工作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不具备建立正规的学位制度的条件，但中共培养社会

科学理论人才和研究生的实践探索已然开始^[17]。当年培养的干部，有一批人成为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导干部和骨干力量，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改革开放初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国内最早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生的单位。1978年10月，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指出：为了实现培养“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答实际问题的革命家、革命战士”的办学目的，我们要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和人类知识精华，同时还要具备对各方面的现实问题、国内外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热烈探讨的气氛，具备密切联系实际进行独立思考的探索精神，具备师生之间自由辩论的学术民主氛围。我们应注重“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向前发展。”^{[21] 458}这一办学思想可谓中央研究院办学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实践，不仅呈现了高等教育的学习形式与内容，而且展现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有益做法，为当前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三）开创构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优良传统

1942年，整风运动初期编辑出版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毛泽东亲自签名送给很多高级干部，普遍认为这是一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的书，对全党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产生重要作用。编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为全党提供思想方法上的指南，成为中共的一项重要传统。1982年，恰逢该书出版40周年，温济泽建议中宣部根据现实需要，在延安版《思想方法论》基础上，依据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出版的马恩列斯全集将该书重新编辑出版，全面呈现马恩列斯关于思想方法的经典论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对这一建议作出肯定性的指示。于是，温济泽主持编成《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书，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

哲学的一本重要参考书^{[21] 348}。该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针,“从根本上强调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旨在从思想方法角度进行反对“左”的教育^{[38] 40}。1989年下半年,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党范围兴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同年,陈云派人要求温济泽查找延安出版的《思想方法论》,温搜寻未果,即将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送去,同时送给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各一本。江泽民收到后由秘书复函感谢,李瑞环批示要人民出版社将该书重印^{[21] 348-349}。

1990年5月,为配合全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一书,“汇集了能较为完整地反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阐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又收入了能鲜明反映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制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思路的一些重要著作。”该书编辑体例与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有所不同,但指导思想一以贯之^[39],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时代的创新性。

中央研究院主持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形成了中共汇编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用以在全党推行思想方法的教育传统,开创中共汇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论述对全党进行思想方法论教育的先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相继编辑出版《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则是在继承前者基础上的守正创新,首次系统汇编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上述三本著作的编辑出版,深刻影响了中共全党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确立,推动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教育了几代共产党人。

中央研究院在存续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取得

了一批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被中央定位为抗战时期全党最高研究机构。其开展的研究工作,是中共为提高自身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功能而采取的重大措施。它的研究实践,呈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景观,对于当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借鉴意义。身处抗战救国的大时代,包括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即从抗战实际出发,服务于抗战大局。这一特点,贯穿于抗战时期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方面,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身处中共思想路线逐渐成熟的特定时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体现了毛泽东要求的实事求是的特征,在研究工作中力求做到从实际出发,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实际问题。整风运动的开展,使得中央研究院全体成员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研究工作一度中断,庞大的研究计划无法实现。除历史研究室初步构建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外,其他研究室在构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方面缺少系统化的重要著作,中央研究院未能完成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中央研究院的改组成立,表明中共中央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意图,这一重要尝试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未能有效地实现。历史表明,理论工作者无法独立担负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最终,这一任务是由领袖群体与理论工作者集体参与、协力完成的。

整风运动期间,中央研究院关于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处理,注重以政治统领学术。在中共中央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方针下,研究工作者从党的指示和意图出发,其工作性质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高度契合,彰显出中央研究院的时代特点。

注 释:

- ①董纯才、张健、华子扬、陈元晖、李冰洁、翟定一:《中国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载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58页。有研究显示,陈如馨明确表示未在研究室工作,因此将其

除外。参见王有春:《抗战时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教育研究——以中国教育研究室为考察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韩凌轩.论延安中央研究院[J].文史哲,2003(3).
- [2]陈如平.关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的历史考察[J].教育史研究,2011(4).
- [3]王有春.抗战时期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教育研究——以中国教育研究室为考察中心[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5).
- [4]吴鼎铭.延安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J].新闻界,2015(19).
- [5]王春泉.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新闻研究室工作计划草案》[J].新闻知识,2019(5).
- [6]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7]曲子贞.在延安马列学院——我最幸福的日子[G]//烟台市牟平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牟平文史资料.2000年第9辑.烟台:牟平区正阳印刷厂,2000.
- [8]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9]理群.策略教育在马列学院是怎样进行的[J].共产党人,1940(13).
- [10]张忠山.马列学院编译部:中共编译史上的重要机构[J].编辑之友,2016(2).
- [11]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N].解放日报,1942-03-27.
- [12]张忠山.毛泽东《实事求是》讲话及其影响[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3]宋金寿.延安的最高学府——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J].中共党史资料,1996(57).
-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6]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17]温济泽.回顾和希望——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建十周年[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5).
-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9]王海军.学科、学术与话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研究(1919—1949):下卷[M].北京:中国

人民出版社,2022.

- [20]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1]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22]新教育学会举办学术演讲[N].解放日报,1941-11-21.
- [23]延安新教育学会,编.行知教育论文选集[M].新华书店,1943.
- [2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 [25]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J].新建设,1951,4(2).
- [2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G].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G].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28]金灿然.《中国历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N].解放日报,1941-12-13.
- [29]叶蠖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J].解放,1941(133).
- [30]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4辑[G].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 [31]林国华,陈峰.论延安时期史学机构的产生、沿革及特点[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 [32]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J].中国文化,1941,3(2、3).
-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4]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N].解放日报,1943-11-08.
- [35]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 [36]马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奠基人[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2).
- [3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 [38]方实,杨兆麟,主编.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 [39]石仲泉.学哲学,最要紧的是掌握思想方法——简介毛、周、刘、朱、邓、陈论思想方法[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0(1).

【责任编辑 刘 滢】

(下转至第128页)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PC's view of Party History in the Past Century

ZHANG Wei, ZUO Li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5)

Abstrac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reviewing it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chieving unity in thinking through study of Party history, the CPC has fostered and publicized a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over the past century, which has, in turn, steadily advanced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view of Party history was presented in works on Party history by the early Party leader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first resolution on the Party's history mar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in the Party.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was promoted and publicized across China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work on Party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nd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During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hile putting things right, the Party adopted the second resolution on the Party's history, reestablished the correct view of Party history and enhanced it constantly in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ideological struggle.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 Party-wide campaign on study the Party's history was conducted, and the third resolution on the Party's history was adopted. The view of Party history has gained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s it has been improved and got widely accepted, becoming a consensus among the entire Party.

Key Words: CPC; view of Party History; resolution on the Party's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nd view of history

(上接第93页)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ilding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NG Zhongshan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cheng, Beijing 100009)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Marxist-Leninist College to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Marxism and Leninism, which was later reorganized into Marxist-Leninist Research Institute, designed to apply Marxism and Leninism to study China's realities. Later,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was set up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by adapting it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institute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adapting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o developing a new democratic educational theory. The research work of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has made a significant bearing on the Party history, as it was the first specialized institution the Party established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it was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talented personnel for Marxist theory, and set a fine tradition of adapting Marxist ideological methods to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Mao Zedong;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